

# 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逻辑探释

汤荣光

(上海市委党校 上海行政学院, 上海 200233)

**[摘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尽显独特历史境遇和思维理路。溯源人类文明思想史根脉,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出独特认知模态,归结为探释文明生成逻辑的基本论题。“文明”展现历史流变的话语范型,其冠名和形塑关涉社会现象、认知冲突、本质意涵等领域,以历史的实存和未来的模态栖居于人类思维结构的深处。“形态”铸就了文明研究的范型,经由事物存在方式与文明发展逻辑演化而来,形成长时段考量、分类化探究文明形态的脉络,映现文明走向与文明形态界分的论题。西方文明充斥着唯我论腔调,谋求文明话语权认知垄断的地位,聚拢为贬损中华文明的认知方式,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信任危机。人类文明新形态归属主体性文化认同与文明塑造,在历史文化禀赋、社会历史发展动因、道义力量以及实践力量诸多方面彰显中华文明主体性重塑的现实可能性。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形态 文明 生成逻辑

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被称为“新”? 确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重在把握人类文明跨越的历史根由,探秘人类文明思想史脉流变基本特征,拓展具象化认知人类文明的空间论域,消散覆盖在中华文明之上的思想迷雾,展示出中华文明主体性重塑的崭新面貌。循此思维路径和方法,盖有如下理论研究的关节点需要释证和贯通。首当考察文明释证的学理之维,把握文明表征的特定对象物,打开文明认知的多维视角和理论图景。继而阐释形态统合文明的意涵,凭借形态所塑就的思维范式,展现文明形态体系化构造的内在元素。再者勘察西方文明话语的僭越,揭露西方文明话语权认知垄断意图,揭示贬损中华文明的错误认知。最后聚焦中华文明主体性重塑,探究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方向,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致思路径。有鉴于此,勘察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逻辑,有助于解答“文明之问”的历史奥秘以及中华文明发展走向的基础性命题。

## 一、文明释证的学理之维

文明的冠名和形塑不啻为恒久的学术谜题。作为历史流变的话语范型,文明存在样式因何确证,划分文明的界域在哪里,文明成其为自身的依据何在? 凡此种种疑问皆需从文明词源加以探察。人类社会历史见诸文明史,文明不仅是历史的产物,还是历史生成和衍化的结合体。何以释证文明概念,关涉人类认识史和观念史,尤其是历史总体性认知嬗变的过程及其特征。借此而论,文明属于人类的认知范型,折射出社会历史观的本质与品貌,进而以历史的实存和未来的模态栖居于人类思维结构的深处。

文明表征着思维领域的特定对象物。在相同或相近的语义系统内,“文明”与民众、公民、社会乃至国家密切关联。希腊语的“文明”含有“公民”之义。拉丁语从希腊语转化使用的文明“Civilizo”,主要指城市化、公民化,延伸出公民权益的、合法的、民法之义。这是从词根“Civis”的意涵“城市民众”生发而来。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概念得以塑形。“文明”最初作为法语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蕴与实践价值研究”(22AKS012);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型构与实践价值研究”(2021FZX01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汤荣光(1972—),男,江苏泰州人,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与实践研究。

词出现。1752 年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使用“civilization”一词。1756 年法国人维克多·里凯特米拉波首次在出版读物中论及文明。1767 年英国思想家亚当·弗格森借助“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阐证“野蛮民族”向“文明国家”<sup>①</sup>进化的历程。文明获得了人类进步事业的基本含义。

文明的话语流变逐步显现道德评价的意味。文明成为古典和现代、城市和乡野界分的依据。1755 年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出版久负盛名的《约翰逊字典》,其中将文明界定为乡村生活相对应的城市生活,但是并未收录“civilization”,只是以“civility”即礼仪替代之<sup>②</sup>。1828 年首版的《韦氏词典》则把“文明”注解为文化和技术水平较高,思想与品味处于优雅的状态<sup>③</sup>。文明的本义及其涵摄对象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展露出历史主体与生存状态交融的特征。

文明从“古典”跨向“现代”的根由何在?文明沉淀在历史之中,经由历史事件展现出来。文明时代无非是个体契合时代而成为文明之人的时代。孟德斯鸠所著《论法的精神》揭示了这样悖论:“在蒙昧时代,干尽了坏事也毫无疑惧。在开明时代,做了天大的好事也依然战战兢兢。”<sup>④</sup>当道德成为某种力量进入历史环节,文明的出场无疑展现必然性的生灭。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认为,“倘若文明不能给社会带来德行的实质与形式的话,那么它对于社会来说就毫无益处”<sup>⑤</sup>。回溯欧洲启蒙运动,文明获得“现代意味”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文明代际生成总是依附于社会身份的变化,封建贵族习俗则渗入资产阶级群体并成为那个世代的模仿对象;二是专制制度的衰败与资产阶级新兴力量的壮大形成鲜明对比,以理性之光迎接新的未来成为时代所需;三是宫廷礼仪普及逐步失去烦琐程式而成为礼貌,礼仪的普遍化扩展至市民社会最后演化为文明;四是宫廷统治的专制和奢靡与新兴资产阶级日益膨胀的欲望相互倾轧,导致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暗潮涌动,一定程度上激荡起文明的思想 and 风潮。

文明在历史中生成并映射新的历史。社会历史动因是体认文明的“解码器”。文明不仅是历史衣胞结出的果实,还是历史发展所播散的种子。学理解证文明,旨在透析文明概念嬗变及其深藏的历史动因,探秘文明思想史脉流变基本特征,开启文明认知的多维视角和理论图景。

其一,文明承载社会现象。人类能够体察自身现实生活并且反思社会现象,揭示文明进步精神追求。人类作为文明的创造者,无疑也是经由社会历史反思性建构文明的创造者。人类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深化认识人类社会规律,自然离不开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明所提供的思维通道。

文明从社会现象中尽显人的生存状态。人类能够体察自身现实生活并且反思社会现象,揭示文明进步精神追求,文明往往在人的生存状态思索和既往历史考证中得以深化。譬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维克托·里克蒂·米拉波所著《人类之友》认为,不只要解释法国或者欧洲的先进,还要应对殖民地问题,解决其带来社会秩序与人口改变的现实处境<sup>⑥</sup>。更为极端的状况还表现为人的生存的遭遇。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针对 14 世纪欧洲黑死病瘟疫肆虐的劫难,认为欧洲文明受到挑战,甚而“有那么一段时间,艺术及其他行业都陷入了瘫痪”<sup>⑦</sup>。社会行业和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动,延伸了如何省察文明的触角。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著名艺术历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拍摄的纪录片《文明的轨迹》就展现罗马帝国解体到工业革命前后的西欧文明发展状态。由此抛出了如何探讨文明命题和人的生存状态的论题。文明意味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变迁,耦合了价值观、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呈现出发散性的样态和研究分支。

① 参见亚当·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王绍祥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年,序言第 2 页。

② 参见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年,序言第 2-3 页。

③ 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韦氏词典》,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1996 年,第 149 页。

④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7 年,第 4 页。

⑤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年,第 39 页。

⑥ 帕特里克·曼宁:《1756 年以来的“文明”概念:世界历史框架下的反思》,刘文明译,《全球史评论》2021 年第 2 期。

⑦ 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郑中求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 年,第 338 页。

其二,文明反映认知冲突。人类的认知结构和精神追求为何会留有文明一席之地?散布在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文明遗存,既是见证社会历史的窗口,也是历时性考察社会历史的认知对象。不同认识主体视域内的“文明”只不过由于区域、民族、文化乃至所处社会历史阶段差异,形成迥异的文明观念,甚而表露出极端的话语垄断。文明涵盖的可能性认知在狭窄的思维甬道中踽踽而行。

文明从历史演进中显现某种认知差异。文明萌生于人类自我意识及其身份确证,人类思维的固化与局限性亦附着于文明的认知。文明的主体间性往往表现为标榜自我优越性。譬如,除却主体民族之外,西方视域中的异域世界等同于野蛮,文明开化只是对待野蛮的方式罢了。又如,罗马帝国时期凭借君主制和强大军事力量,压制日耳曼等周遭部落和民族并视之为蛮族。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揭示了19世纪基督教国家排斥奥斯曼帝国并称其为“国际社会”<sup>①</sup>之外的根源。文明认知模式伴随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盛行而固化。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尽管认为文明意味着社会与个体的进步,但也肯定其衡量尺度在于“16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概括”<sup>②</sup>。欧陆文明近代占据主导并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区分文明与野蛮成为不自觉的价值判断前提。西方文明成为定式的背后,无疑是文明极化现象及其话语垄断的明证。

其三,文明具有本质意涵。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文明的基本范畴。人类通过有目的活动“物质生产劳动”区别于其他动物。人类在劳动中占有了自己的本质,社会生产力就体现出这种本质力量。文明因为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物质生产劳动而生成和汇聚。文明不仅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还是以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共同活动逐步形成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功能所在。

文明从本质意涵中彰显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社会立足于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断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衍生出庞大的生产潜能,与之相匹配的文明样态发展并形成生命力和聚合力更强的观念体系。诚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sup>③</sup>。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才是把握社会历史前进趋势的依据。不可否认,每个时代都相较于上个时代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作为社会历史界分的重要标准,对应涵括了蒙昧、野蛮、文明等阶段。诺贝特·埃利亚斯认为,文明首次出现则是“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sup>④</sup>。文明在历史比较中获得现时代的意义。这种泛着相对主义认识微澜的观念,显然并没有脱离经济社会发展事实,仍是处于物质生产活动漫长周期变动的表现。确乎此,文明是人类存在形式和存在状态的必然表征。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不断掘进,文明统合社会处境、思想观念等差异,体现出社会生产力的阶段性发展。尤须认识到,文明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并作为社会生产力标识存在,人类文明形态伴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当从文明视角窥得历史,必将显现人类实践的发展结晶,并获得具象化塑形文明的可能。

## 二、形态统合文明的意涵

形态铸就了文明研究的范型。社会历史跃迁潜藏着人类文明纷繁复杂的表象,既有文明研究的分支与程式加剧了文明勘察的困难。如何把握文明内在规定性,统合文明的意涵?正是作为思维范型的“形态”,提供了具象化认识文明的可能。借由形态这一思维中介,文明既可以由学理性概念转化为具象化的社会实践,也能总结归纳不同领域创造的成果并赋予其本质意涵。文明经由形态塑造得以拓展具象化认知的空间论域,促进了理性化表达的话语构建,进而为整体认识文明形态提供了支撑。

<sup>①</sup> 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 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章永乐、魏磊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sup>②</sup> 刘文明:《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述评——以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为中心》,《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sup>④</sup>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页。

形态反映特定事物的存在方式。基于事物存在可以感知和把握的前提条件,形态延展出追寻事物本源的思维进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赋予形态“eidos”的寓意,认为形态存有通达事物本质的可能。亚里士多德专注于建构形态的具体特质,认为事物由形态和物质构成。他在《形而上学》中以“盖房子”比喻形态与物质的关系。砖头和砂浆是一种物质,给它一种形式就成为一座房子,给它另一种形式就成为一堵墙。故而“实体和具有该实体的东西应当分离地存在着,这好像是不可能的”<sup>①</sup>。如果把文明当作实体,那么其内在的形态似乎也不可能与其本质相分离。形态是否蕴含着特定的目标和动因呢?

形态蕴含物质及其属性的论题。不同于物质及其构成,形态与物质本身的特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荷兰著名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作出解释并认为,“某物所包含的任何实在性或圆满性都形式地或超越地存在于其最初的和恰当的(adaequata)原因中”<sup>②</sup>。正如《牛津英语词典》中形态的释义即“赋予形式或形状”,由此彰显出事物发展方向的可塑性。黑格尔所界定的形态更为趋近物质的本质意涵。他强调,“物质的个体性在其直接的定在内是内在性的形式,这种形式给那种物体的物质以一种固有的特定的区别,这就是形态”<sup>③</sup>。形态意味着作为固有的区别能以“内在性的形式”区分事物。文明样式向文明形态的转化,是否也因循这样的思维路径呢?

形态能够耦合文明发展的逻辑范型。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文明及其分支如何以形态方式得以确定,文明的分支何以确证文明的整体呢?社会历史深处的文明嬗变,无疑表征着寻觅文明形态化的生成问题。形态能够贴合并推动其他理论范畴形成特有的认知体系和逻辑范型。正是借助于形态这一认识通道和思维范式,文明体系化塑造才能突破学科分野的局限,进而能够从社会形态、文化形态、人的解放中提取和总结文明形态的基本构成要素。

首先,社会形态提供长时段考量文明形态的参照系。社会形态表现出清晰的历史分期,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同向发展也见诸于此。如何表述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或人类发展进步状态,无疑是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必然涉及人类生存活动组织的整体形式“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立足唯物史观划分社会形态并形成特有文明取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重点辨析分工与所有制关系,强调真正的分工始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

社会形态变迁引发文明形态深刻变化。工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工,造成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生产和交换规模的扩大,则导致商业与工业也开始分离。《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分工程度的不同形成前资本主义的三种社会形态,即“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形态<sup>④</sup>。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把整个世界纳入生产体系,不同民族间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体现着民族间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地域性的生产变为世界意义上的生产。社会形态变迁引发文明形态的深刻变化。故此,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对应的文明形态具有封闭性和地域性特征,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生成并推动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形态也才具有了现代范型和世界意义。

其次,文化形态彰显分类化探究文明形态的侧重点。文明与文化尽管表述各有侧重,但二者内涵相互交织并且缺乏明确的定义边界。文化的尽头留有文明的印迹,文明的历程则充盈着文化的兴衰起落。文明在德语体系中被认为是表面的、次一等的有用之物,与之相反,文化的意涵更贴合英法语系中的文明之义。

文化与文明关系是重塑文明形态的关节点。一方面,文化与文明出现了混为一谈的倾向。文化形态被视同为文明形态介入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专注于文明进程研究的诺伯特·埃利亚斯直言,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页。

② 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王荫庭、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1页。

③ 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薛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3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2-523页。

“德国人自豪地谈论着他们的‘文化’,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自豪地联想起他们的‘文明’”<sup>①</sup>。文明以特定状态表征文化的结果。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不仅把文化作为人类醒觉的产物,而且作出“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运”的注解<sup>②</sup>。由此恰恰说明,面对西方文化日趋衰落现实,历史形态学派表露出悲观主义的理论倾向。另一方面,文化与文明在人类精神世界中出现了叠合的取向。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成果,文化是社会实践成果的象征。二十世纪著名的人道主义学者阿尔贝特·施韦泽在所著《文化哲学》中阐明,并不存在“文化”与“文明”之分,两者均彰显“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sup>③</sup>。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成果,文化是社会实践成果的象征。文化形态与文明形态交融互证,开启了文明形态研究的新视域新理路。

再次,人的解放程度显现出社会形态内含文明走向的可能。文明主体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人才是文明的建设者、推动者、受益者。社会形态和人的解放,在其历史发展阶段上保持一致性。文明在社会之维可以聚焦为人的解放的命题。

人的解放程度关联文明认识的程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自由个性<sup>④</sup>等阶段。对照上述阶段,西方资本主义曾经局部实现了人从封建专制统治中的解放,自由、平等、民主的口号驱散了专制和愚昧。资产阶级回顾既往历史,自然认为这是由野蛮民族向着文明国度的进化。然而,真正获得自由解放的只是资产阶级,而占据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则只能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牺牲品,成为本质力量异化的对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述,“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资产阶级意识不到<sup>⑤</sup>。静观当下,面对生存危机与现代文明危机,资本主义文明或西方文明的优越性黯然失色。如文明取代野蛮那样,只有彻底消解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基础,才能赢得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赢得文明的重塑和再生。

最后,西方文明根基表征文明形态界分的精神意念。西方文明的认同糅合了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拉丁文明以及日耳曼文明等诸多特征,保持着认识精神实体的惯性。西方文明起源与转型经历漫长历史过程,从来都不缺少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的“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宗教神学一直被推崇为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和伦理准则。

文明在西方精神领域展露出宗教神学的面貌。文明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文明的核心议题。正如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言,“宗教是文明中最强有力的特征,始终是过去和今天的文明的中心问题”<sup>⑥</sup>。从中不难看出,宗教神学释放出西方文明的普遍意义。汤因比称之为“各种文明产生,使其延续下来的生机源泉”<sup>⑦</sup>。这样的精神旨归是否就是文明的本质和核心呢?文明生成动因并非文明的本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文明不过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宗教不过是为掩盖剥削关系的以“资本”核心的“遮羞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sup>⑧</sup>。显然,资本主义文明只是杂糅着虚假的神学信仰。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及其精神面貌的塑造尤显急迫。

确乎此,形态统合文明的意象异常繁复。借由形态考察人类文明变迁,能够从本质上揭示文明形态的动力源泉。文明形态逐步显现出实体化发展路径,能够通过形态来把握其演进过程与内在架构。文明形态的构建不是单一话语体系的简单堆垒,更不是某个社会历史阶段突然萌生的价值诉

①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4页。

②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第一卷·形式与现实》,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30页。

③ 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⑥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冯棠、张文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⑦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36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求。尚可存疑于此,总体把握文明形态还是不足以明晰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奥秘。

### 三、西方文明话语的僭越

文明形态逻辑生成体现在文明话语权建构之中。无论代际相承的抑或是历史遗存的文明,均凝结着人类认识史。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尽管存在历史时空分布和特定区域差异,但为何能在文明及其形态化的思维历程中实现统合,更为确切地讲,文明形态是否有认识的“门槛”和瓶颈?由此触及文明话语权的论题,涉猎不同文明形态在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样态诸方面的客观评价与认识尺度。文明认识的可能性维系着文明话语权的解蔽与革新,这无疑会掀起思想史深处的波澜,引发文明实践的深层讨论。

文明话语权塑造几乎是西方思想界保持的传统项目。姑且不论西方文明话语建构所展现自身文明优越性的意图,仅从其认识体系的坐标中即可遴选出评判中华文明地位的代表性观点。当然,其中较为盛行的观点形成了文明话语权认知的垄断并聚拢为贬损中华文明的认知方式。

一是赋予中华文明专制色彩。欧洲启蒙思想家之所以无情挞伐封建专制制度并表达文明的理念,就在于竭力宣扬新兴资本主义,使得隐藏在神秘面纱背后的东方古国不可避免地沦为诟病的对象。昔日西方冒险家游记中壮美的中华文明,却在启蒙思想家眼中仅剩厌恶和乏味。孟德斯鸠就抛出过这样的观点,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sup>①</sup>,封建专制制度催生出士大夫文明,但中国封建社会秩序中的奴性只会导致愚昧与无知。卢梭在论证科学与艺术复兴时认为,中国这个亚洲领土广袤的国家,“如果科学可以使风俗日趋纯朴,如果科学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牺牲,能鼓舞人的勇气,中国人民早就成为贤明的、自由的和不可战胜的人民了”<sup>②</sup>。显而易见,欧洲文明标准创制过程渗透着批判和诋毁中华文明的意图。透析这些观点,中国人民的贤明与自由仿佛成了空中楼阁,沦为遥不可及的幻象。

二是指证中华文明停滞状态。倘若翻阅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谱系,不难发现中华文明常常处于迟滞状态并面临文明话语短缺。西方文明为了体现自身优越感,无情地抛却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基因和传承。黑格尔哲学体系论及古代中国就充满了机械否定观的味道,正所谓“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帝国,只是自身平静的发展着,从来没有从外部被摧毁”<sup>③</sup>认为中华文明不过是历史的不断重复,发展状态的僵化使得中国丧失自由的可能性。十九世纪“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甚嚣尘上,甚而炮制出“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论调。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宣扬中华文明始祖黄帝来自古巴比伦,中华民族作为诺亚后代的后代自然成了“外来户”。值得质疑的是,中华文明何以丧失文明话语权?文明佐以社会发展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理解中华文明不能仅从西方某些观念本身的运动中求解,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来剔抉其奥秘。

三是放大中华文明异质属性。西方历史学和汉学研究大多遗存着中华文明的刻板面孔。中华文明常常被贴上了缺乏生命力和造血功能的标签。美国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晚清史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西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两种文明”。<sup>④</sup>他从所谓文化产品上认识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差异并宣扬“民主、个人自由、人权、法治都是美国(西方)文化的独特产品,并不能移植到以农民为主体而又具有长期专制统治的中国”<sup>⑤</sup>。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些对个体自由和平等的限制,中西方文明的不可相容性被赋予了具体内容。费正清的弟子、美国汉学家芮玛丽专注于探讨“同治中兴”的保守主义问题并认为,“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水火不容”<sup>⑥</sup>,进而渲染中华文明中存在愚昧、迷信和离经叛道的现象,古人的思想或信仰只会对中国社会的现代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7年,第152页。

②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③ 黑格尔:《黑格尔全集》(第27卷 第1分册),刘立群、沈真、张东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4页。

④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⑤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黎鸣、贾玉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11页。

⑥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房德邻、郑师渠、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化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种观点人为剥离了中华文明中的现代化诉求,使得现代化等同于西方,现代文明专属于西方,中华文明被排拒在现代文明门外。

四是鼓吹中华文明带来的威胁。文明话语权构建是系统化的庞大工程,话语的流向直接决定文明制高点的位置。加拿大籍华人学者梁鹤年曾阐释西方文明特点并认为,“对唯一真的坚持也使他们容不了异己,限制了视野”<sup>①</sup>。借由中华文明传统重视宗族权威和专制政治,辅之以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西方社会勾勒出现代社会的“古代中国”。美国汉学家沈大伟认为,中国的强大不过是要在东亚寻求中心霸权,“崛起的中国对于未来的影响是凶险的,而非不确定的”<sup>②</sup>。西方社会认为,东亚必然会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建构起新的朝贡体系。西方文明似乎是东亚地区带来进步的福音,而中华文明不过是要维护旧有体系。如何保证西方文明话语权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上述观点捏造出中华文明的威胁论并提供持续诋毁中国的有力筹码。西方社会施展的这一招数,既带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提供了反面教材。

五是构造西方文明的对立物。西方社会因由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而弥漫着焦虑,进而妄图在不同文明之间寻找冲突的突破口。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中国国力增强无疑会挑战西方威权和西方文明,其中充斥着诋毁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论调。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毫不隐讳地讲,“一个强大得多的中国,就会尝试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和19世纪美国把欧洲列强推出西半球差不多”<sup>③</sup>。这种充满可地缘政治偏见的观点不仅折射中西方文明对立,还会生成“孤立主义”政策并加剧文明的冲突。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凭借软实力诸如“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达成合作的议程设置和为合作提供重奖”<sup>④</sup>等功效,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具备挑战西方文明的能力。西方文明寻求自身的对立面,明显表达消除异己文明的诉求与意图。

西方垄断文明话语权意图由来已久。文明不可能一枝独秀、独木成春。正如社会历史发展要打破线性思维的困境和掣肘,人类文明进步也要摆脱文明话语的唯我论腔调。文明话语权非但不能排解文明形态发展的窘境,相反会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信任危机。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故步自封于西方文明最为直接的后果在于,仍会持续矮化和丑化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不同文明样态,人类文明形态的创新也将留有更多实践疑难和理论期许。且作出推论,文明话语权困境及其解蔽是一道世纪难题,不仅需要考证社会历史发展动因,还不可或缺创造人类文明形态道义力量、实践力量和独特范型,不可或缺社会主义制度创造和展现的优势,因为争讼不休和碰撞不止终将解决不了问题。借此可从中华文明历史变迁中加以确证。

#### 四、中华文明主体性重塑

中华文明蝶变与人类文明整体演进同向同行。人类文明新形态归属主体性文化认同与文明塑造,并非囿于确证自我优越性的意图。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无疑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也是人类文明连续性发展的典范之作,在近代却因为内外交困导致危机频现,带来自身文明发展的断裂带。如何重塑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貌,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机理,掘进式探究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方向?由此关涉中华文明主体性再造的基础性论题,内嵌着证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致思路径。

文明主体性获得的根基在于历史性实践。殖民掠夺的老路行不通,国强必霸的歪路靠不住,和平发展才是人间正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其文明向度不仅有助于破除文明话语霸术,而且构建起文明交流对话的新机制新图景,彰显了中华文明主体性重塑的现实可能性,大抵可从如

① 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91页。

② 沈大伟:《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丁超、黄富慧、洪漫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195页。

③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8页。

④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实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下诸方面予以论证。

一是历史文化塑造出中华文明迥异西方文明的独特气质。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原生的动力。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等梳理中国古代思想,得出“中国的国民思想之所以‘晚出’,是古代社会‘早熟’的必然结果”<sup>①</sup>的重要结论。“早熟”的中华文明营建出强调传习的发展逻辑,不论社会如何变迁都不曾丧失文化的遗脉。文化隐藏着文明的奥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展现独有的民族特质和东方神韵。现代考古学奠基人夏鼐考证,“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sup>②</sup>。中华文明追求仁政和德治、倡导大同和民本、讲求修睦和善邻等价值理念,内蕴着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精神禀赋,跃动着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要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未曾中断的社会历史赋予中国伫立世界文明舞台的根基。要深刻且精准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与内核,势必需要更好地理解其突出优势和独特标识。

二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因蕴藉着中国创造新型文明的可能。近代世界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但凸显为资本主义肆无忌惮的全球扩张,还积压着众多民族国家遭遇劫难的惨痛历史。当引以为傲的中华文明被外来的力量践踏无存,辉煌厚重的“文明大厦”便会在朝夕间面临崩塌。中华文明如何重建主体性?思想领域的争论先声夺人,沉寂已久的革新动力蓬勃涌起。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传统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良方,“东方文明中所说的‘王道’指的就是民主社会的理想,也就是拥戴有德君主之治”<sup>③</sup>。与其针锋相对的主张则是“不破不立”。正如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驱李大钊所言,“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sup>④</sup>。相关论辩尽管表露不同立场和政治文化诉求,但展现谋求中华文明新生的渴望。“新旧杂糅”的现实境遇不断萌发出中华文明转型的条件、可能性与限度。中华文明崭新图景伴随近代中国社会发内在矛盾的沉积和解蔽而凝结为社会制度变革的强大动力。可以说,文明的传承有其内在规律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与涅槃重生的动因和可能即在于此。

三是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中华文明重生和重塑的道义力量。近代中国社会因为外部力量入侵和干涉而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中国人民备受列强欺凌,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中华文明岌岌可危。如何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破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催促有识之士觉醒和中华儿女抗争的清醒剂,也为古老中国迎来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日出提供了历史契机。马克思曾经做出预测,“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sup>⑤</sup>。这样的预言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不多见,但揭示了东方社会未来发展的内在动因所在,消解了遮蔽中华文明的厚厚阴霾。借此可以推论,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sup>⑥</sup>,尤其在初始阶段就是要解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关键在于打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个结合”释放出中华文明重生的道义力量。

四是中国共产党聚合实践力量并给出了文明重建的答案。文明新生不但需要实践探索的艰辛过程,还需要物质力量和精神武器。中华文明塑造的主体力量在哪里?中华文明是否具备现代转型的能力?此当归属文明主体性重塑的核心论题。回望百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

①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②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

③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黄兴涛编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320页。

④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页。

展的趋势和格局”<sup>①</sup>。“三个深刻改变”的实践力量在于中国共产党,实践道路在于社会主义,实践成果在于中华文明的重塑。诚如历史学家陈旭麓所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阐明,“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又以客观现实限制了主观愿望。这个矛盾,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sup>②</sup>。著名党史专家胡华亦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随着客观实践而不断发展的”<sup>③</sup>。基于深刻把握中国实际和中华文明特殊性,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社会矛盾的独有方式,探索并制定出与世情和国情、党情和社情相匹配的路线方针政策,才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五是中华文明独创成果规避了西方文明发展嵌套的危机。旧事物消亡预示着新事物勃兴。中华文明得以赓续书写崭新篇章的奥秘在于其保持独立性和独创性的内在禀赋。李大钊曾高瞻远瞩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sup>④</sup>。中华文明主体性重塑,恪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发展实际,贯通绵延不绝的文脉,进而汇聚起气势磅礴的民族复兴气象。中华文明重塑依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创造来完成,因其吸收了传统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中的合理因素,全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路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sup>⑤</sup>。实践证明,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使中国实现了从亚洲文明中心走向世界文明舞台的转变,中华文明显现出新的历史生机与活力。中华文明发展摒弃了剥夺性、寄生性积累的方向,不仅在现实上呈现出摒弃既往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交往逻辑,而且在根本层面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西方现代化普遍有效的价值预设,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文明演进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始终作为促进世界文明发展的建设者和推动者,自觉承担起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

综上所述,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备受理论期待,其生成逻辑仍待深入探释。环顾宇内,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脚步不可遏制。人类文明差异岂能因山海之遥、肤色之别、国家强弱等附着等级划分的标签,文明之间并非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差等关系。聚焦中国,中华文明的重生与重塑,充分显现出人类文明发展模态的重大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诞生于中国更奉献于世界,内蕴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主体选择的能动性的有机统一,既坚守中华文明身份认同也与其他文明相融互通,有助于推动中华文明主体性塑造,有助于重新确立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话语交流对话的机制和能力。

(责任编辑 万 旭)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②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79页。

③ 胡华:《胡华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06页。

④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

⑤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1页。